

蜕变与更新

——现代化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变迁

周 运 清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人社会心理变迁的三个主题:1、在现代化冲击下,由于数千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稳态生活失衡,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失重。2、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普遍失范,以至无所适从,从而出现角色的迷惘与心理冲突。3、社会心理由失重到冲突,由冲突到更新,从而导致中国人传统社会心理的蜕变和职业心理、价值心理、文化心理的更新以及整个心理空间的拓展。

当今世界,人类的现代化历程充满了惊心动魄的较量。不用说铁与血的斗争无法避免,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社会心理的冲突等,无不都在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社会成员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这是一次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大变迁,研究和寻求这一社会大变迁的内容、过程和规律,用于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代社会变迁是一部大书,作为一篇论文,我只能仅就现代化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变迁的若干方面,简述一些粗浅的个人见解。

一、社会稳态失衡与传统社会心理失重

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是在以传统文明为基础的小群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以单一种植业为中心的农业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旧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农业文明史最长的国家,而且是以血缘亲族关系替代经济社会诸关系的封建古国。上自皇亲国戚,下至贫民百姓,都以家庭和家族为基本社会方式。一个家庭,一片土地,每个人都依赖家庭和家族生活,从而为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奠定了稳定而深厚的历史基础。

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的历史基础有如下三大特征:

1、生产方式落后。在小群社会,生产方式的落后性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单一的种植业,生存资源贫乏,世代简单重复。第二,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生产规模小,生产和发展能力小。第三,以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第四,生产力水平低,整个物质生产过程几乎完全依赖自然力,包括人力、畜力、水力和地力等,是典型的自然经济。

2、生活方式封闭。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封闭的社会生活方式,其封闭性集中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生活范围狭小。在小群社会,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范围都以家庭为圆心,以大约10公里为半径,构成一个有限的生活圈。这是依赖土地的自然经济过程决定的。第二,社会交往少。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人们的体力和时间,几乎全部被农业劳动剥夺,除了因必要的物质交换(主要是盐和铁)而发生的社会交往外,主要是亲属交往。第三,世代交替简单重复。在上述情况下,子承父业,财产世袭,单向教养,从而形成世世代代的封闭心态。

3、思想文化落后保守。思想文化的落后和保守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教育不发达。第二,封建愚昧。第三,家族主义。

如果说上下5000年的小群社会滋生和润育了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社会心理,那么,要维持传统社会心理的平衡,就必须维持传统的小群社会。但是,自从工业化发生以来,人类就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国的小群社会在现代化潮流中受到冲击,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也因此而受到挑战。

那么,现代化是怎样冲击小群社会并引起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失重的呢?

1、社会生活科学化。小群社会是依赖自然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依赖科学的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过程正在从自然依赖中解放出来。据统计,从1938年到1978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3倍。这一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不仅使近代历史的先行者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开始用自控方式替代传统的自然方式,而且使一些国家的劳动时间从每周6天和每天8小时至12小时,下降到每周5天和每天6小时。预计到2018年,人类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到8倍,到2058年,可能提高到25倍。由此可见,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都将逐步摆脱传统的自然状态。中国现在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急速转变中,随着小群社会及其传统根基的不断改造,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就会不断地出现不平衡状态。

2、职业方式社会化。在以单一的种植业为基本物质资料来源的小群社会,职业方式家庭化,个人谋生依赖家庭,从而形成人们的家庭依赖心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生存舞台不断拓宽,人们开始自觉地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由于谋生方式的变化,整个社会生活开始由依赖家庭转向依赖社会,传统的依赖心理开始失重。

3、世代交替制度化。稳定的世代交替过程,是传统社会心理世代延续的基本社会条件之一。世代交替主要有三大内容:即生命传递、职业传递和文化传播。在小群社会,上述三大传递只有在家庭里并通过家庭才能进行,因而世代交替始终处于稳定状态。现代社会,除生命传递主要依赖家庭外,职业和文化传播逐步从家庭转向社会,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完成。如通过劳动就业制度完成职业交替,通过教育制度实现文化交替,等等。这就是制度化的世代交替。随着世代交替制度的发展,传统社会心理在世代交替中向现代转化。

当然,现代化是从众多方面来影响和冲击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的。中国人历来依赖小群社会,依赖家庭生活方式,而这些正是现代化冲击的对象。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小群社会和家庭生活方式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失重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双重角色的迷惘与社会心理冲突

从现代化冲击到社会心理失重,从社会心理失重到社会心理更新,这是现代社会心理变迁

的两个阶段。根据社会发展与社会心理承受力和心理支持相统一的良性运行原则,实现社会心理第二阶段的变迁,对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那么,社会心理第二阶段的变迁是怎样实现的呢?简而言之,就是在现代化冲击下,经过激烈的社会心理冲突,促使传统社会心理发生蜕变而实现的。原来,在现代化冲击下,无疑会使传统的社会稳态被打破,而传统的社会稳态被打破的突出表现和直接后果,就是在社会活动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普遍失范,以至无所适从,从而出现角色的迷惘与心理冲突。就一般规律而言,角色迷惘与心理冲突的结果,无疑是社会心理的蜕变与更新。

1、改革开放与双重角色的迷惘。

中国是落后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来推进的。虽然是大势所趋,合乎规律,但是或多或少带有人为的色彩,很多人是被推进改革大潮的。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一身而二任,充当双重角色,这就是既可能当改革的促进派,又可能当改革的保守派;既可能当传统的批判者,又可能当传统的拥护者;既可能当现代化的建设者,又可能当现代化的破坏者。根据刘崇顺同志在《社会变革中的心理冲突》*中所述,在上述双重角色中,最坚定的改革者也可能动摇过,最缺乏心理承受力的懦弱者也大多举起双手拥护过。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

1)、认知局限造成的迷惘。中国的改革,除了少数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思想深刻的改革家,一般群众对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开始就缺乏透彻的了解。特别是在改革的决策层,尽管强烈感受到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认识到中国的前途除了改革,别无它途,但对改革的战略、方针、步骤、方法,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以至可能出现的恶果,并不是一开始就了如指掌的。因此,很难保证事事判断准确、决策得当,因而,尽管是锐意改革的改革家,也难始终保持自己的动力角色。

2)、利益权衡造成的错觉。在改革开放中,人们之所以陷入双重角色的困惑之中,除了对改革的认知局限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各自切身利益的权衡。农村的改革,普遍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因为广大农民确实从改革中得到了好处。而城市的改革,情况就复杂多了,其结果是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有了极为强烈而又各不相同的心理体验。如“富了摆摊的,穷了上班的”。“从政之路红彤彤,从商之路金灿灿,从学之路黑洞洞”。“工人乐,农民笑,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等等。一句话,在改革中,在同样的事实面前,人们对自己所属的职业群体的利益水平进行评价时,常常自觉和不自觉地低估自己的水平,而高估他人的水平。于是人们普遍都有一种失意感、失落感。这是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一种明显的社会心理负效应。这种由于对自身利益的高度敏感和极度关心造成的心理错觉,使得人们对改革的效果和成败难以作正确的评价,不同群体之间由于利益冲突造成的心理冲突也就难以消弭。

3)、传统惯力造成的定势。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双重角色心理的迷惘与冲突,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根源于传统惯力造成的定势。在改革中,人们免不了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纵向比较。一般而言,这种比较是有益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比较弄不好也会产生一种失真的反差或错觉。特别是当改革遇到挫折、产生失误的时候,当改革在某些方面给某些群体造成暂时的利益损失的时候,甚至要付出一定代价和作出牺牲的时候,怀旧心理、“回归”情绪就会表现出来。如人们希望通过改革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但因畏惧竞争和冒失业的风险,又留恋过去的“大锅饭”、“铁饭碗”。又如,人们希望发展生产力,希望物质丰富,并痛感旧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一旦触动旧的经济体制,放开了物价,整个社会又怨声载道,叫苦不迭。于是,一部分人又开始颂扬以前的低物价。尽管人们对传统深恶痛绝,但也往往摆脱不了传统的束缚和

影响,足见传统惯力之大。强大的传统惯力,有可能使人们从利益上、观念上乃至行动上,自觉不自觉地站到改革的对立面,成为改革的阻力。

2、社会行为失范与社会心理冲突。

所谓“失范”,就是用以指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的法律、制度、道德等社会规范的丧失,使人们在行为上和社会活动中无所遵循。在改革开放中,新旧体制交叉并存,旧的规范体系被打破了,而新的规范体系一下子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会在全社会出现一种普遍的失范现象。由于失范,人们会感到困惑、茫然,产生激烈的心理冲突。

1)、理性与情感的冲突。人们在变革的时代,特别是在社会行为失范的状态下,整个社会的心态文化,时刻都会处于种种矛盾冲突之中。我们知道,在整个心态文化即社会意识中,社会心理是一种尚未被文化专家们加工制作的初级形态,它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直觉认识、情感动机和朦胧的价值意识等等,因而可以被称作是一种“生活意识”。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等社会意识形态,是经过从事精神生产的专家加工制作的,具有完美的形式和严格的体系,被称作“科学意识”。高层次的社会意识,一般具有活跃的变异性,在社会变革时期往往成为改革的先导,并可能短期内发生新旧更替。如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思想的解放,新的理论和新的观念的出现,常常使人有一种“今是而昨非”的感觉。相比之下作为生活意识的社会心理的变异性远远不及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它不仅根源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而且积淀于世代相续的传统文化之中,具有顽强的惰性和惯力,往往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变革和整个大系统变革的障碍,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理性上尊重知识,直觉上追求金钱;理论上弘扬科学,情感上神往空门;理性上崇尚开拓进取,感官上贪图安逸享受;理性上认同自觉精神,心灵上难以摆脱对国家、对单位的依赖;在显意识中,对机会均等、平等竞争之类原则说得头头是道,在潜意识里,则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等等。这说明,在社会变革中,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许多新思想和新观念在理性上被人们接受与认同,但在心理上和情感上,人们仍然为历史与传统的惯性所左右。

2)、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冲突。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冲突,有着复杂多样的流变与表现形式。70年代末期,人们逐步从一种讳言物质享受和物质利益,只讲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的病态心理中解脱出来,逐步认识到物质利益和物质追求的合理性,进而理直气壮地把“求实”和“求富”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与此同时,人们比任何时候都痛感“文革”十年的空前浩劫及导致的科学文化教育的荒芜给民族、国家和个人造成的严重恶果,于是心理的天平向求知求学方向倾斜。“文革”中流毒全国的“读书无用论”遭到举国一致的唾弃。然而,由于伴随而起的商品经济的大潮,猛烈地冲击了半自然经济田园牧歌般的温馨与宁静,知识开始贬值,金钱开始以其诱人的光环占居人们的心灵。十分微妙的是,当新的“读书无用论”再度抬头的时候,也正是教育立国、科技兴国的呼声响彻云霄的时候。这种令人费解的矛盾现象,正是人们在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这两者关系上的心理冲突的反映。可以肯定地说,在一些人求学求知的背后,无疑隐藏着求钱求富的动机。

3)、传统与新潮的冲突。在人们的心理世界,始终存在着传统与革新的冲突,进入社会变革时代,这种冲突尤为激烈。在变革的时代,特别需要的是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传统心理中那种抱残守缺、一味求稳、怕担风险、因循守旧的心态,必然成为变革的对象。这是惰性心理与进取心理的冲突。与此相联系的是主体性心理与依赖性心理的冲突。前者是指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动精神,后者则是指对一切客观条件的依赖。在社会心理世界,传统与新潮的冲突,往往以曲折复杂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人生态度方面,由于人们可能因偏好追求感官满足的

生物本能而偏离理性走向极端,却被标榜为新潮。这是以新潮之名行反传统之实,而新潮并不等于反传统。因为,对于传统,只有有所继承才会有所摒弃和创新,从而才会实现对传统的超越。体现风俗与时尚的心态,最能表现出传统与新潮的两重性。风俗是传统的表现,具有稳定的延续性,表现历史生活的惰性与惯力。时尚则是一种趋时的风气,具有追逐新奇的倾向,富于变异性。然而,风俗,有逆时之风,也有应时之风;时尚,有推进改革的新潮,也有旧物复现的流俗。它们相互交织,纷繁复杂,在人们的心灵世界发生猛烈的碰撞。

三、嬗变中的若干社会心理

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心理的嬗变与冲突,总是同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变革相伴而行的。如果说变革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世界是一个万花筒,瞬息万变,那么作为其晴雨表的心理世界也会随之变幻无穷。由于社会改革的成功有赖于这两个世界经由矛盾冲突而达到统一,有赖于传统社会心理的蜕变与更新,所以我们有必要随时研究和把握社会心理的嬗变状态。然而正如法国的维克多·雨果所说的那样,社会心理是一个比江湖、海洋和天空更加宽广的世界,因而,在这里只可能就那些最容易被人感知的、也是最容易影响社会变革与社会生活的社会心理变化,作一些粗浅描述。

1、心理空间的拓展。

以改革开放为新起点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已经和正在拓展着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舞台和社会心理空间。

在传统的小群社会,家庭既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又是一个基本的消费单位,是人们从事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由于生活舞台的局限,造成了人们社会心理空间的狭窄。如家族主义心理、变态平均心理、乐感文化心理等众多传统社会心理,无不体现当时社会心理结构的狭窄性。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兴起之前,由于社会管理体制上的弊端,人们的生活舞台和交往联合虽然有了进步,但是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仍然是“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人们习惯于依赖家庭,依赖国家,依赖组织。这种发育不良的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80年代兴起的改革开放,推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经济生活领域的横向联系,加快了社会人口的水平流动,人们的社会生活舞台开始从一维空间、二维空间发展到多维空间,即从家庭、工作单位拓展到广大的社会生活领域。与此相应,人们的社会心理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外投趋势,这标志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空间出现新的拓展。

社会心理的外投趋势,首先表现为人们视野的拓展。人们在生活中不仅关注家庭,而且关注整个社会;不仅要求了解中国的改革,而且要求了解国际社会现代化的规律,把视野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寻找可资借鉴的参照系。其次表现为国内国外区位间流动的加速。在小群社会,人们总是“安土重迁”,“静守佛地,视远行为畏途,不敢越雷池半步”。现在中国农民开始由“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人口流动幅度迅速扩大。与此同时,“出国热”、“留学热”和“外婚热”经久不衰。

2、职业心理的震荡。

职业活动不仅是全部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对社会而言还是对个人而言,职业和职业心理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变革中,人们对人事制度、干部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以及对一切同职业有关的制度的改革反

应最为敏感,这些方面的改革所引起的心理震荡也最为强烈。

职业心理的震荡首先表现为“铁饭碗”危机。职业,人们通常称作“饭碗”。有了职业,生活资料才有来源,才算有了饭碗。改革开放前,由于分配和劳动就业制度的弊端,人们一经就业,也就如同进了职业保险箱,端上了“铁饭碗”。可是,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多年端着稳稳当当的铁饭碗,如今不那么稳当了。面对铁饭碗冲击,人们震惊、茫然、兴奋、惆怅,酸甜苦辣中蕴涵着失去“安全感”。于是,人们开始以不同的心理承受力和承受方式接受现实。识时务者,决心适应改革的潮流,在竞技场上一显身手,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创造自己的“饭碗”。而一些不明智的人却作了不明智的选择。

其次表现为职业选择方式和选择标准的更新。不管人们怎样评价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人们对“铁饭碗”的认识、态度以及选择方式和选择标准,都不得不随改革大潮而进行变革。根据职业意向的权威调查,在职业选择方式和标准上,各种传统的偏见不断受到新的职业心理的挑战,如“从政热”降温了,“当官心理”淡化了,风险意识增强了,职业追求的目标由以往的盲目“攀高”转变为把“一般岗位”作为自己谋生和立业的归宿。令人忧虑的是,在职业选择中,实利主义是一种主要动因,它给人们带来的义与利、眼前与长远、现实和理想的深层心理冲突和困惑是难以平复的。正因为如此,职业心理的更新是十分艰巨复杂的。

3、价值心理的变革。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伦理文化为特征的中国小群社会,在价值心理取向上带有浓厚的禁欲、制欲、寡欲色彩,道德价值被推崇到压倒一切社会价值的地位。在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革命,使得人们开始不再遵从传统的价值心理取向,而是独立地重估一切价值。

中国的传统价值心理,从根本上无视主体的选择权利。道德义务和道德行为的承担者大多是个体,但道德行为和道德义务的价值指向,却主要是对群体和社会的。行为主体、义务主体和利益主体、价值主体是分离的,或者说,个人虽然是行为主体,但在其现实性上,往往意味着作出牺牲,付出代价。传统的价值心理取向,总是习惯于从社会的角度和群体的角度审视个人,一切道德权利归社会和群体,一切道德义务属于个体,个体只能消极地适应社会和群体。在这种传统价值心理的压抑和束缚下,个体的生命、利益、人格被贬低乃至淹没。现代化发展唤醒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和个体价值意识,在处理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时候,人们开始奉行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

人的价值目标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推进价值目标多元化的变革中,一个重要的倾向是价值心理取向混杂化。价值心理取向混杂与价值目标的多元倾向不同,前者主要是指价值取向的混乱、偏离与失范。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新旧体制交替,心理上固有的稳定结构被打破,道德评价中的错乱和失当,也就难以避免了。要消除人们在价值心理取向上的混杂状态,不仅需要推进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而且必须悉心培养人们的心理定势。

4、文化心理的转化。

文化心理是文化教化的结果,是人作为一种行为有机体的表现方式,是一个社会的一种历史积淀性结构,一种隐性、稳态性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一是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念。这两个特点,正是建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支架。这种文化心理的潜结构,同现代人的素质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对传统的文化心理而言,抗拒和阻碍社会变革,是它与生俱来的特色。传统文化心理是传

统文化的反映,是维护传统文化最强大的无形力量。社会变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开始往往只能冲击其结构的表层,尽管看起来似乎已经给予重创。其表层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已经积淀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深化和浸透在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其深层原因,在于传统文化心理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改造力,能在旷日持久的文化冲突中,日渐溶入新文化之中,使之失去本来的面目而成为一种新的传统,从而成为真正的新文化的对立物。这是传统文化心理的巨大惯力。

惰性和惯力是传统文化心理所固有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心理不可能永远保持它的稳态。现代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传统心理向时代心理的转化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心理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旧的平衡打破了,经由一种困惑、迷惘甚至失落,又会达到新的平衡。这种新的平衡,一般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产生的积极向上的平衡,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主导性的心理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转化中,有少数人在原有心理平衡被打破后,总想回到原来的平衡状态中去。这种转化可能产生一些消极效应,需要积极地加以科学地控制和调适。控制和调适的办法很多,最根本的是加速现代化进程,改变传统文化心理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一旦现实生活实现了对传统的改造和超越,依附于传统的文化心理也就被抛弃了。

注 释:

※ 参见刘崇顺著:《社会变革中的心理学》,香港中华科技出版社出版

(本文责任编辑 涂赞琥)

(上接第 16 页)

著名的控制海洋倾倒的国际公约除了《奥斯陆倾倒公约》外,还有 1972 年 12 月签订于伦敦的《防止倾废及倾倒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简称《伦敦倾倒公约》)。虽然《伦敦倾倒公约》的签订在《奥斯陆倾倒公约》之后,但其中的某些规定反不如先签的《奥斯陆倾倒公约》那么严格、具体和明确。原因之一就在于《伦敦倾倒公约》是全球性的,而《奥斯陆倾倒公约》是区域性的(仅适用于大西洋东北部的海洋倾倒)。正因如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以后,大力倡导建立区域性环境保护国际组织,签订区域性环境保护协定,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自 1976 年以来的十几年里,地中海、波罗的海、波斯湾、几内亚湾等一些曾遭受严重污染的区域,都陆续签署了区域性环境保护的国际协定。现在,区域性环境保护的国际协定已构成国际环境法的重要内容。

注 释: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第 206—207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
- ② 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二版),第 239—240 页,法律出版社 1991 年版。
- ③ 罗典荣主编:《环境法导论》,第 310、322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④ 韩德培,肖隆安主编:《环境法知识大全》,第 220—221 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⑤ 程正康著:《环境法》,第 447—451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⑥ 张崱青编著:《国际环境法概论》,第 1、19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本文责任编辑 车 英)